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26
国内邮发代号: 1-88
国外邮发代号: W4993
主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主办: 新华书店总店
协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

新华书报

CHINA LIBRARY WEEKLY

馆社之桥 人文之魂 阅读之美 书香之园



第567期

00 03-567

总第689期

2021年9月17日

文献保护 专刊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7期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国家图书馆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 回信精神两周年座谈会



本报讯 9月13日,国家图书馆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两周年座谈会,进一步深化学习、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回顾总结两年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工作情况,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为指引,全面推动国家图书馆事业转型创新发展。

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副书记熊远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主持会议,副馆长张志清、陈樱、张军、霍瑞娟出席会议。

会上,国家图书馆有关部处的6位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对照《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精神推动事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及有关项目工作台账,分别汇报了两年来本部处各项工作的具体举措和主要成果,以及对未来有关工作的考虑和建议。

会议认为,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图书馆党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馆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为指引,不断提升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强调,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国家图书馆初心使命和事业发展方向、发展任务的指示精神,坚持在常学常新中准确把握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自觉将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推动事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

会议要求,要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夯实业务基础,不断提升国家图书馆依法履职能力”“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十四五’时期各项事业高质量创新转型”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勇担开拓创新、转型发展的时代责任,凝心聚力、再接再厉、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回报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建设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家图书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国家图书馆各部处有关负责同志和各馆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

白玉静

导读

02-03 业界动态

《中国近代城市史料丛刊·广州卷》第一辑出版

南京图书馆举办线上珍贵古籍特展

2021年四川少数民族古籍业务培训举办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巡展走进西双版纳

04-05 古保风采

碯图古籍的守护人

她是让故纸复活的“书医”

古籍修复技艺进山东大学

06-07 图书推荐

《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

《陈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二册)(精装)

08 历史钩沉

被日所劫3万余册古籍归还始末

抗战时期郑振铎抢救珍贵古籍新史料发掘研究(1)

本报顾问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惠平(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蒸(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森(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中国近代城市史料丛刊·广州卷》第一辑出版

本报讯 适逢广州建市一百周年之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持整理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中国近代城市史料丛刊·广州卷》第一辑共五十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丛书是2018年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整理出版项目,旨在搜集整理、抢救保护民国时期广州文献史料,推动广州城市史研究。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行政区划建制意义上的第一个市。1921年2月《广州市暂行条例》颁布和实施,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广州也因此获得“模范之广州”“建设都市之指南”等美誉。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和中国民主革命

策源地,广州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转型和变迁中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且较为完整的文献资料。《中国近代城市史料丛刊·广州卷》依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汇编民国时期广州各级政府机关,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机构,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等编辑出版的有关广州的文献约2500种,分辑出版,并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分类编排。第一辑收录文献184种,包括社会科学总论和政治两大类。为便于查阅,本辑首册列全辑总目录,每册再列该册目录;每种图书依据题名页、版权页、卷端和书眉,著录书名、著者、版本;个别书名、著者、

版本信息不全的,依据文献内容考证酌拟。

《中国近代城市史料丛刊·广州卷》所收录的文献,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广州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历史、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增进对近代广州城市建设与发展历史轨迹的了解,从而为当下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另外,此项目的顺利开展,亦可为日后继续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城市史料丛刊各城市分卷提供借鉴。如本丛书前言作者程美宝教授所言,希望丛书的出版能让一代一代学人,“在这些故纸新版中把握住广州近代文明的脉络,守护住广州这个精神家园”。

贵州民族大学
古籍保护
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贵州民族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古籍保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讨会不久前在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大学等机构的相关专家参会。

贵州民族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下设“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古籍修复与技艺研习中心”“基于GIS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据研究中心”“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贵州民族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院将立足抢救性保护,重点突出民族文字古籍保护,争取成为国家民族文字古籍保护重要的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为一体的机构。

贵州民族大学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和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2014年与贵州省古籍保护中心共同申报并获批成为全国首批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之一,2015年图书馆成立了古籍修复中心,2016年成立了“贵州民族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实现了收藏、修复、研究“三位一体”的古籍保护战略。目前,该校图书馆藏有汉文古籍3.7万余册(件),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献资料5万余册(件),地方文献资料5万余册(件),3部水文古籍在去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截至目前,共修复古籍、契约等古旧文献37800余页,为省内外培训古籍普查、编目、鉴定、整理等人才500余人次。

南京图书馆举办线上珍贵古籍特展

本报讯 截至2021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南京图书馆共有631部藏品入选,占总量的近5%,位居全国省级图书馆之首。近日,为了更好地宣传古籍,展现中华典籍之美,南京图书馆以这批代表性馆藏为主题,在线上举办了“楮墨流辉——南京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展”。

展览根据“唐宋本”“辽金元本”“明清本”“稿抄本”四个专题,从631部入选古籍中再度遴选出112部,每种古籍配有基本信息说明和主要内容介绍,并附有一至二幅反映版本特色的书影,分批分期予以展示。所选古籍形式多样、珍品迭出,涵盖了内府、藩府、私人、家塾、书坊等多种刻书机构,版本包括套印本、活字

本、拓本、铃印本、彩绘本等等,不一而足,具有极高的文献、文物及艺术价值。整个展览选题精准、图片精美、文字严谨,全面展现了南图馆藏古籍的特色和价值,鉴赏性极高;同时系统地体现了南图古籍收藏的深厚积淀与传承有序,充分彰显了中华古籍之美。

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大媒体都对此次活动进行了专门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新华网转载展览当天的浏览量即达到160万次。学习强国平台首页对此进行了专门推送。“江苏文脉”等公众号也纷纷与南图取得联系,了解更多的展览细节,策划专题,及时进行宣传、介绍和推广。“江苏文脉”就元刻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中的藏书家印鉴、扉页柳如是男装小像等

文化因子,撰写了专题文章,饱含丰富的南京地方文化特色,且趣味十足,读来生动鲜明,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等,也第一时间转发了此次展览,并对南图古籍宣传推广给予了充分肯定。

缙绅数映,楮墨流辉。南图此次线上“晒国宝”,是2021年“晒书节”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南图古籍保护成果的一次充分利用和展示。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等手段进行有效推介和宣传,让读者更加方便地赏古籍、增知识,触碰更多文化典籍和藏书故事,充分领略古籍之美,做到了全民共享。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南图继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树立了更多的信心。 李姣

2021年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成功举行

本报讯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古籍保护工作任务,完善升级古籍普查成果,促进中华古籍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古籍总目·重庆卷》的编纂工作,重庆图书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于不久前开展了为期三周的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并取得圆满成功。

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重庆图书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经过前期调研,志愿者招募、遴选以及专业培训等环节后,有序实施志愿者服务工作。根据工作内容,将志愿者分为三个小组,分别进行古籍著录、审校数据、扫描书影等工作,定期轮换,本馆专业老师同步指导,

答疑解惑,并及时检查质量。在为期三周的志愿者活动中,志愿者们充满热情,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精神,积极投身到古籍普查工作中,认真仔细,协作互助,累计著录登记900余部古籍,审校数据3200余条,扫描书影1700余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志愿者服务结束后,由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家对书目数据、书影图片等成果进行检查、验收、总结,为志愿者们颁发了活动证书,并将及时向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报告实施成果。

重庆图书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将以此次志愿者服务工作为起点,探索方向,积累经验,为此后重庆市长期开展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奠定良好基础,也为古籍保护的宣传



普及做好推广工作。在锻炼志愿者同学工作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华古籍的热爱和对古籍保护事业的热情,为我国古籍保护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021年四川少数民族古籍业务培训举办

本报讯 2021年四川全省少数民族古籍业务培训班近日在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举行。来自全省民宗系统、民族古籍工作相关单位的4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内容涵盖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保护与修复、数字化建设、政策理论讲解等方面,采取专题讲座、

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进行。

据四川省民族宗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培训旨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少数民族古籍工作

的任务和方向,激励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者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

开班当天,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同美以“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新思路”为题讲了培训第一课。他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新时代中国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新理念、新途径、新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提出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发展思路,特别是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在促进民族古籍工作取得成效上如何发力,进行了深

入讲解。

参训学员表示,今后要不断学习开眼界、创新实践提能力,力争成为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开拓创新精神,综合素质过硬、掌握专业知识、业务精湛的民族古籍工作者,为本省民族古籍工作贡献自己力量,让少数民族古籍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出版成果展亮相石家庄市图书馆

本报讯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石家庄市图书馆承办的“激活经典,熔古铸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出版成果展”不久前在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A馆共享大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9月底。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是由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所选图书上起先秦,下至辛

亥革命,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立足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化典籍,囊括哲学、文学、历史等各个学术领域具有重大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100部经典著作,每一种经典都延请国内研究该文献的权威学者担任解读人,对其进行导读、诠释、注解、点评,以当代眼光解读古代典籍。截至目前,该工程已完成《周易》《尚书》《史记》《论语》《传习录》《聊斋志异》等40种图书

的编纂出版,这些成果汇聚成此次出版成果展,以期让更多读者亲近经典,读懂经典。

本次展览将已编纂出版的40种《百部经典》介绍给广大公众,引领公众走近名著,阅读经典。石家庄市图书馆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作用,力求深入浅出,化繁为简,让大众读懂经典、理解经典,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读者,使中华经典传之久远。

图片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整理规范地方文献,方便读者对馆藏地方文献的查阅利用。重庆北碚图书馆近日组织全体党员、团员及中层以上领导干部20余人对地方文献室进行了整理。地方文献的收集与保存是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北碚图书馆积极开展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现有馆藏地方文献1878种2754册,内容涵盖北碚、重庆地方文史资料。目前,地方文献室已成为北碚图书馆对外服务的重要窗口之一,年均接待读者100余人次,为社会各界提供文献资料查阅、复印等相关服务。接下来,北碚图书馆将继续加大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保管工作力度,不断丰富馆藏,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北碚地方文化。

新闻速读

浙江天一阁征得珍贵古籍两种 再现活字泥版印刷技术

本报讯 近日,浙江天一阁博物院成功征得珍贵古籍2种共18册,分别是清雍正活字泥版印本《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十二册和清初汲古阁抄本《金石录》三十卷六册。这两部古籍稀有罕见,对补充天一阁馆藏乃至浙江乡邦文献均有特殊意义。

其中,《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是清代浙江新昌人吕抚撰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通俗长篇小说,主要内容是对廿一史中的历史故事进行再次加工。这部书最具价值的是其绝无仅有的制作及印刷方式,即活字泥版印刷技术。泥活字印刷技术是北宋年间毕昇所发明,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但目前存于世的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工艺的记载只有在宋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可见。吕抚在毕昇的基础上创造发明了活字泥版印书方法,并将这个工艺详细记录在了《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这部书中。

山东省图书馆举办“2021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图书馆五楼册府琳琅展厅举办了“诗书继世,察古知今——2021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活动分为两部分: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晒国宝、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晒技艺。山东省图书馆以历史悠久、馆藏宏富而著称,至今形成了规模宏大而又具有特色的馆藏,主要有:海源阁专藏、易学专藏、齐鲁地方文献、佛经专藏、金石拓片等。此次向公众介绍五大镇馆之宝,以激发全社会分享典籍、传承文化的热情和力量。在活动第二部分,山东省图的古籍修复师们展示了雕版印刷、碑刻传拓、古籍修复技艺。已经残破的古籍内页,在这些修复师的手下,经过复杂而缜密的修复,基本恢复了整齐的样子。

第五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工作启动

本报讯 第五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工作会议不久前在沈阳召开。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许红英出席会议。

会上,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杜希林通报了第五批《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及“辽宁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情况,并宣布新一届辽宁省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名单、辽宁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名单。许红英为14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证书,并就推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加大古籍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实现对珍贵古籍的分级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组织专家对全省申报的古籍和古籍收藏单位进行集中评审。评审结果经省古籍保护工作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会签后,上报省政府批准向社会公布。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巡展走进西双版纳

本报讯 “传承民族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巡展(西双版纳站)”启动仪式近日在西双版纳州民族博物馆举行。

本次西双版纳站巡展将持续到10月7日。此次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巡展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实物和古籍传承人现场演绎等多元化的形式展出。古籍珍品涵盖彝文、傣文、傣族音乐、东巴文、藏文等十余个少数民族文种古籍。同时,还展出了古籍复制、修复和再造善本代表性成果,并安排纳西东巴、傣族贝叶经制作等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演示。

西双版纳各民族创造了多姿

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拥有珍贵的傣族文化遗产贝叶经、古代文献佛经典籍、勐泐文化地方文献,其中不少属孤本、善本、珍本。在省民宗委等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先后成立了“西双版纳州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室”和“西双版纳州古籍保护中心”,深入开展全州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普查、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有效保护和传承各民族历史文化和智慧结晶。由西双版纳州翻译整理的《中国贝叶经全集》,为我国傣族文化和南传佛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对进一步研究东南亚傣泰民族文化以及东南亚、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天水市图书馆“2021中秋传统古籍晒书活动”举行

本报讯 今秋开学前,天水市图书馆“2021中秋传统古籍晒书活动”如约而至。浓浓书香沁人心脾,册册古籍连通古今。隔着“邵力子捐书陈列室”内一扇扇藏书柜面,一本本古籍善本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不凡魅力。

“和平老人”邵力子捐赠天水的一批珍贵图书在这里安家落户并得以善珍善存。80多年沧桑岁月,80多年守书护书,这批古籍文献已成为天水市图书馆核心馆

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4楼古籍部,上方挂着“邵力子捐书陈列室”扇形木制匾额的门楣两边,“力学庐中藏经典,子孙世代惠恩泽”的淡黄色木制对联集于右任之字,古朴典雅。

当邵力子捐书陈列室的门打开的瞬间,孩子们稚嫩的眼神里闪过兴奋和惊叹,他们听工作人员讲解了古籍的制式,以及古籍在纸张十分珍贵的年代所代表的价值和线装古籍的制作过程,对古籍有了初步的认识。

碚图古籍的守护人

□北碚图书馆/供稿

他们很少在聚光灯下侃侃而谈,却习惯了在书库的白炽灯下默念“四角号码”;他们无论男或女、年长或年轻,却最常被说是身带“书香”的一群人;他们收入普通,却照看着传承文明的不少“无价之宝”……他们就是重庆北碚图书馆古籍文献部的馆员们——碚图古籍的守护人。

“厉华老师,刚刚我们去书库查了,您要的1931年9月11至19号的《新蜀报》,我们馆藏没有,天这么热让您久等了,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民国文献回溯建库,以后您再过来查这方面的资料就不会耽误这么久了。”这是不久前古籍部主任王琰在文献查阅室接待文博二级研究员、原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厉华老师时的一幕。

虽然这个读者有点特殊,但对于古籍部的同志们来说,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和平常也一样。了解读者查阅的书目,检索卡片目录,两人一组进库找书,交予读者阅读,把书送回书库……“看似很简单的流程,但是在我们的部门如果不呆个两三年,很可能是连书都找不到的。”面带稚气的王琰笑着说道。

古籍部现有馆员7人,多为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们中有的甚至已坚守岗位30余年,即使这个阳光、年轻的33岁部门主任也已和古籍文献打了7年交道。作为基层图书馆,古籍部主要负责馆藏古籍及民国文献的整理、保护、利用和为读者提供相关的文献服务。他们坚持每日巡库,定期翻检古籍和投放防虫药物;已整理出版《重庆市北碚图书馆等八家收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北碚图书馆馆藏宋拓圣教序》等图书5种111册;年均接待读者300余人次,有国内外专家学者、学生和党政机关等,他们还常为外地读者提供代查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读者提供送书上门,为更好保护文献提供扫描服务等;馆员胡涛曾被评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王琰所说的“民国文献回溯建库”是北碚区在2020年第四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中立项的《图书馆资源利用及数字化建设项目》第一期民国文献保护利用有关内容。第一期建设投资435万元,内容包括民国文献回溯建库及出版《北碚图书馆馆藏民国书目提要》、采购民国报纸装订、民国报纸全文数字化、搭建民国文献数据库和民国文献成果转化等。“回溯建库就是把我们的馆藏文献信息的目录,由传统的馆藏目录卡片格式或书本格式转换为计算机可读的机读目录格式,让它与相关文献统一,从而实现馆藏资源的现代化、数字化、自动化。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对我们摸清家底和保护利用意义重大。”王琰介绍。

今年5月,北碚图书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民国文献编目著录及回溯建库工作。为既保进度又保安全,古籍部的同志们坚持两人一班,每天进书库、出书库、取书、还书、数书、核对编目。目前,已完成



开展民国文献编目著录



专家来馆指导民国文献编目著录工作



开展古籍书影拍摄

民国图书著录89318册,正抓紧著录报纸和期刊,预计9月底全部完成。王琰说,“以前,我们总对外说馆藏民国文献有10余万册,这次终于可以把这个‘余’字说清楚了。”

在紧锣密鼓开展回溯建库的同时,北碚图书馆还进行了民国文献成果转化工作,策划了《民国史料丛刊——碚城览胜》出版和字画复制、手提袋、背包等馆藏文献文创产品研发等。接下来,还要整理出版馆藏民国文献书目,继续实施民国文献数字化,建立民国文献数据库,通过专题展览、阅读推介等方式宣传推广民国文献保护。

“我是学历史的,喜欢往旧书堆里钻,我们馆是卢作孚先生1928年建的,第一任馆长是张从吾先生。除了民国文献,我们还有10万余册古籍,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我有幸成为北碚图书馆古籍文献部的一员,说实话是敬畏的。这些年,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到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计划,国家从上到下对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都越来越重视。我们的第一期民国文献保护利用项目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一定还会有第二期、第三期……因为我们有责任让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为更多人所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王琰最后说道。

北碚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始于2016年馆藏地方志数字化,历时3年,共完成429种4059册,并于2018年初步建成“北碚图书馆历史文献数据库方志板块”。2019年,北碚图书馆继续开展古籍方志数字化工作,同时将馆藏珍稀方志100种发布在历史文献数据库中。通过不断完善,现读者能够通过外网访问“北碚图书馆历史文献数据库”,查阅202种1178册16万页古籍方志。随着民国文献数字化的有序推进,北碚图书馆馆藏古籍及民国文献将更便利、更广泛地服务大众阅读和学术研究。

她是让故纸复活的“书医”



□湖北省图书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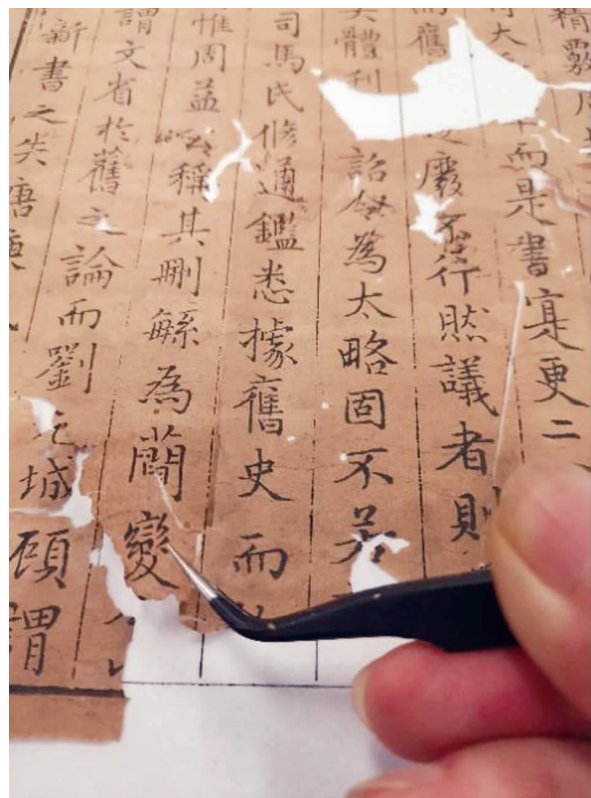
湖北省图书馆古籍部的盛兰是一名古籍修复师,日常工作就是对本馆古籍进行保护与修复。霉蚀、水渍、酸化、絮化、虫蛀、鼠啮……古籍“病因”各不相同,修复师作为古籍的医生,解读这些历史的痕迹,就是望闻问切,制定最稳妥的修复方案;拆书、配纸、清洁书页、修补、压平、折页、修边、锤平、压实、齐栏、打眼、穿捻、装订、贴书签……一册破损古籍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会迎来新生。

《唐书》是刚刚修复入库的一册古籍,它是编目整理工作时发现书页已经严重酸化,脆成数十块,一碰就掉渣,一个呼吸或者走动的气流都可能吹跑残片,如不进行抢救性修复会造成文献信息丢失。

接到紧急修复任务,首先需要清场,要求修复桌旁不要有人走动,戴上口罩“屏息静气”数小时,将残片展平一片一片进行拼接;酸化的纸张呈现出焦褐色,库房里没有合适的补纸,就一遍又一遍地对补纸进行染色,只为了让补纸与树叶自然融合;古籍残片已糟朽受潮后极为脆弱,毛笔一碰到树叶,有时笔画都会分解,这时就需要慢慢增加环境湿度降低修复风险。

古籍修复的过程不亚于一场“外科手术”,修复师与医生一样需要很好的体力,长时间的专注,强大的判断力和良好的心态。

唯有对古籍怀有敬畏之心,耐心细致,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不断精进技艺,才能让故纸复活,让历史传承。盛兰说:“每当翻阅古籍修复档案,一部部古籍从糟朽到重获新生的过程会一一浮现眼前,心中是满满的幸福,我想我也许是最幸福的人吧!”



古籍保护,你我同行

古籍修复技艺进山东大学

□韩爱先 郭琪 张冠群 刘楠(山东大学图书馆)

“古籍保护,你我同行——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大型传统文化公益体验活动不久前由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与山东大学图书馆共同举办。此次活动参与人员所学专业多与古籍相关,大大增加了活动的交流性。活动设计的具体的体验项目为雕版印刷、传拓、线装书制作和古籍单叶修复。为保证体验活动质量,此次活动采取提前报名的方式招募参与人。为了确保活动能带来更多的收获,图书馆还印发了宣传材料,介绍了几项相关技艺。

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是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画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2009年,雕版印刷技艺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活动现场,修复师仔细地为学生讲解雕刻的相关知识,让师生们了解到雕版印刷在我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体验过传拓和手抄书叶的师生更是为技术革新带来的方便快捷而纷纷点赞。

传拓拓片:传拓拓片是记录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古时的石刻书法作品和文字记载等多以拓片形式留存于世。而拓片是由拓印技艺制作而成。拓印过程是先把一张坚韧的薄纸事先浸湿,再敷在石碑上面,用刷子轻轻敲打,使纸入字口,待纸张干燥后用刷子蘸墨,轻轻地、均匀地拍刷,使墨均匀地涂在纸上,然后把纸揭下来,一张黑地白字的拓片就复制完成了。由于此法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所以也称金石传拓技法。

在传拓技艺区,师生们在修复师的演示和指导下,学习这一传承上千年的复制技术。一位学生摸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拓片,连连感叹,过去学习书法也常常临摹名帖,没想到真正的拓片是如此立体、生动。

线装书制作:线装是古籍装帧形式的一种。纸张产生之后,古籍装帧形式主要经历了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式的演变,渐渐形成了古朴、典雅、简洁、实用的独具民族特色的装帧形式。线装产生于明,由蝴蝶装、包背装等装帧形式演变而来,装订方法与包背装书籍前面的工序几乎完全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书衣外订线,更加美观而

牢固,因此也作为最完美的一种装帧形式。

在修复师的讲解和演示下,同学们认真按步骤操作,每人都能独立完成一本线装书的制作,加深了对于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的理解。

古籍修复:古籍修复技艺自产生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为文化的传承及文明的传递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目前文献中关于古籍修复行为的最早记录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修复一本普通古籍,大致需要拆书、揭页、溜口、补破、压平等二十多道工序,全部为手工完成。修复所用材料、设备、工具必须确保其安全且有效。比如修复时用的纸不仅精选极其相近的颜色纸纹基本一致的纸,浆糊必须是去除面筋以后的糊糊,这样的浆糊性质温和稳定性好,而且具有操作的可塑性,修复材料必须是天然的不能含有化学成分,不能用胶水,更不能带双面胶。

这些知识使每一个参与者都得到了真传,普及传承方面不仅有自豪感,还有了一种担当。

在古籍修复技艺体验区,古籍单叶修复是今年活动的新增项之一。修复师先从正确的古籍修复观、书医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及从业的个人条件等入手,强调古籍修复的神圣感和使命感,然后演示修复具体操作。同学们在实际操作中感受到了修复的不易,并在困难克服中拥有了满满的成就感。

在《四库全书》抄写体验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良苦用心打动了现场师生。这次提供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复制件经过了精心挑选,从“关关雎鸠”到“大江东去”,耳熟能详的经典在这里带来了不同的感动。师生们效法古人手抄经典,听修复师讲述《四库全书》历经的劫难,体会前人为保护文物、传承文脉付出的艰辛。大家默默一丝不苟抄写,在人声鼎沸中开辟一方清净天地。

此次活动不仅让同学们亲身参与了“神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直观地了解了古籍修复传统技艺,还宣传了古籍保护的理念,使中华优秀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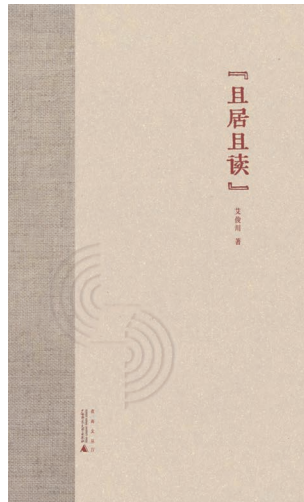
统文化传承意识在校园师生中得到了推广,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部分体验者纷纷发表感言,有的同学说:“呜呼!吾侪青年,常困在芸窗之下,久倦于书斋之中。今逢胜饯,亲体实学。得识匠心独运之艰,而慨继学往圣之责。来年有时,愿以青缙为媒,简帙为约,再续此缘,方不有恨矣。”还有同学说:“古籍修复是个精细的工作,看似简单的喷水、展平、刷浆糊、上纸、压平、撕去多余部分几个程序,在老师的手

中进行得轻松迅速,在我的手上却是状况百出,不是浆糊刷少了导致补纸脱落,就是刷多了导致书叶起皱,好不容易粘上了补纸,又被验收工作的老师指出补纸帘纹没有对好打回去返工……折腾了两三个来回,终于验收通过……参与这次活动的同学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意识,会像一粒种子在公众中传播发芽。”

很多师生兴趣浓厚,当场表示愿意做图书馆的志愿者,今后将朝着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方向努力。

《且居且读》: 学习古籍版本 鉴定的 实用手册



本报讯 《且居且读》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作者艾俊川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文章合集,文章包括文史考证札记、研究心得体会、藏书经历漫谈,内容涉及版本目录、藏书校勘、文字训诂、辨伪考据,既是一本文史知识的趣味读本,又是一本学习古籍版本鉴定的实用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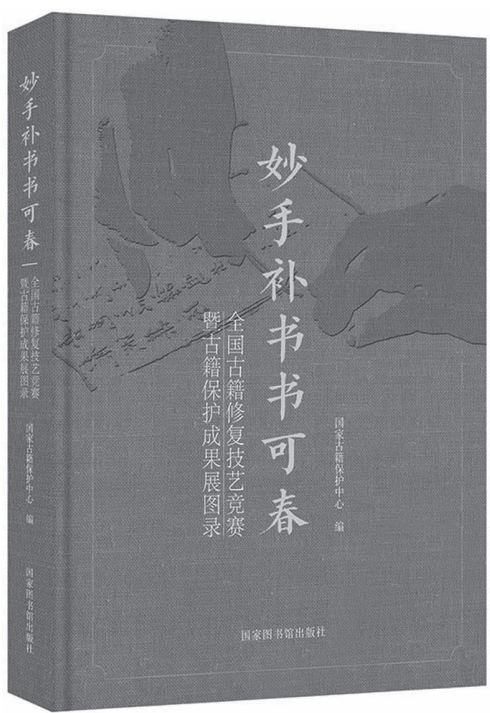
如何鉴定古籍版本?程甲本《红楼梦》为何各不相同?如何“海淘”获取“异书”?《且居且读》从真实的读书生活经验出发,在闲读中尝试解决所遇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别具一格的E考据方法,分享从实践中得来的E考据经验,为文史爱好者开拓便捷可行的研究路径,可谓是一本文史考证的入门之书。

全书文字清新,笔调轻松,行文生动,深入浅出,富有雅趣,可读性强,且装帧考究,适宜收藏。

作者艾俊川,哈尔滨人,定居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现为《金融时报》编辑,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藏品鉴定与研究委员会委员,古籍与文史爱好者,著有《文中象外》等。“且居且读”本为艾俊川的博客名,用以表达他对生活与读书的向往。

江水

《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7月
ISBN: 978-7-5013-7284-3
定价: 280.00元

2019年8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结合中华传统晒书活动,组织举办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此次竞赛是新中国成立以來首次举办全国范围的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汇集了全国21个省份43家单位推选的百余部参赛作品,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共79件。2020年9月,获奖作品与珍贵古籍修复作品一同在“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中展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为进一步总结竞赛成果并延续展览效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特制作本书,以图录形式展出重大修复成果和优秀古籍修复作品。同时,本书还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古籍修复的原则、工具、设备、技术等基础知识,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等读者关心的内容。实践作品与基础知识汇于一书,图文并茂,生动直观,可以说是一本绝佳的古籍修复入门读物。

目录

第一单元:

巧技天工——古籍修复原则和技艺

第二单元:

科学助力——古籍保护中现代科技的应用

第三单元:

生生不息——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

第四单元:

经典重光——古籍修复成果展示

第五单元:

妙手匠心——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获奖作品展示

推动古籍修复事业不断发展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中华典籍历史悠久,世代相传,但也时刻面临水火兵燹、霉侵蠹蚀的威胁。在古籍传承与保护中,古籍修复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将古籍重装比作延医治病,“医善则随手而起”,“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良工养成一般须师徒相传、口手相授,长期实践方能成才。为使古籍修复技艺得以传承延续,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陆续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中国书店、上海图书馆等单位举办培训班,培养古籍修复人才,为修复技艺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直持续推进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工作。2008年,“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此为契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建立了培训基地、高等院校和传习所“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举办各类各级培训班、开展从中专至研究生的学历教育、师带徒的修复技艺传习等方式培养修复人才。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共设立了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32家传习所。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经过各方多年努力,全国古籍修复人员数量从不足百人增加到近千人。年轻古籍修复师的学历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涌现出一批热爱古籍修复事业、全身心投入古籍修复行业的优秀人才。全国各地开展了西域文献、清宫“天禄琳琅”珍贵典籍、《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宋刻本《文选》、山西典藏宋辽金元佛经、云南纳格拉洞藏文古籍等重大修复项目。十余年来,全国累计修复古籍超过370万叶,取得了丰硕成果。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古籍修复师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利用科技手段改进修复方法,提高古籍修复的科技含量,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借助现代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等学科知识和科技设备,正在从经验修复走向科学修复。

2019年8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合中华传统晒书活动,面向全国启动了“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这是全国首次举办的以古籍修复为主题的技艺竞赛,是全国古籍修复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成果展示。本次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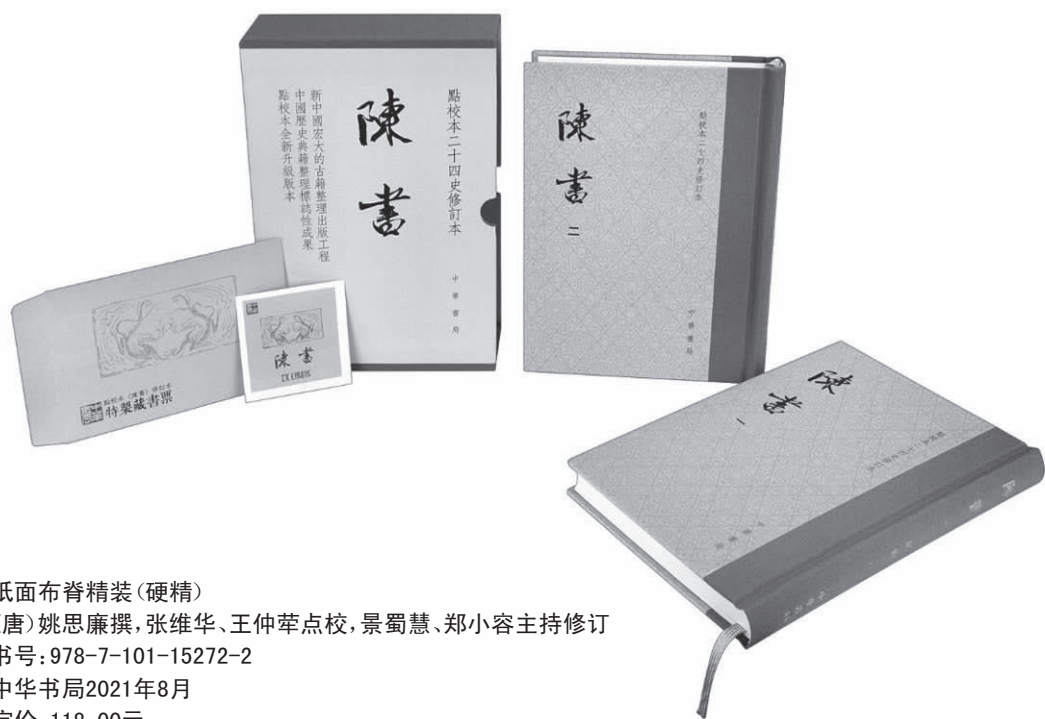
赛汇集了全国21个省份推选的43家单位100余位古籍修复师的近百件修复作品,经过专家匿名评审,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2020年9月,“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共展出修复成果103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展览基础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纂了《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古籍修复重大项目,展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在古籍修复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图录》分为“巧技天工”“科学助力”“生生不息”“经典重光”“妙手匠心”五个单元。“巧技天工”与“科学助力”分别呈现了古籍修复原则、技艺和科技;“生生不息”回顾了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成果;“经典重光”“妙手匠心”则分别展示《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重大修复项目,以及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中79件获奖作品,揭示修复过程、技艺,并做点评。同时,《图录》还原了展厅场景,让大众能更直观了解此次展览的全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潮州市考察时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五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守护典籍、传承修复技艺,正是我们践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保障工作,意义重大。

《图录》编纂工作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和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同人的倾力支持,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览部、缩微文献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协同合作下完成。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希望以《图录》付梓出版为契机,进一步与各方通力合作,铭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使命,推动古籍修复事业不断发展,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大贡献。

《陈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二册)(精装)



纸面布脊精装(硬精)
(唐)姚思廉撰,张维华、王仲荦点校,景蜀慧、郑小容主持修订
书号:978-7-101-15272-2
中华书局2021年8月
定价:118.00元

内容简介

《陈书》三十六卷,包括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陈王朝自开国至灭亡三十多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陈朝史籍。

中华书局一九七二年点校本《陈书》,以商务印书馆据宋大字本影印的百衲本为底本,与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择善而从,同时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的有关部分,并吸取了前人研究成果。本次修订,改以上海图书馆藏1933年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之九《陈书》为底本。在尊重原校本成果的前提下,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广泛收集并充分参考清代以降尤其是点校本《陈书》出版以来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成果,对原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纠正讹误,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形成一个文本准确、校勘精良、标点合理的修订本。

1. 唯一完整传世的记述南朝陈历史的重要典籍,唐代官修正史之一。
2. 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撰成,保存大量原始史料。
3. 集合学界近五十年研究成果,《陈书》原校本全新修订升级版。
4. 限量发行精装本10000套,每套均有唯一收藏纪念编号,附赠藏书票一枚。

作者简介

原点校者: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山东寿光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西交通史等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华书局参与《陈书》点校工作。

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著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专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的点校整理工作。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

修订主持人:

景蜀慧,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91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方向为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思想学术、中古疾病医药史及南朝史籍文献等。主要代表著作有《魏晋诗人与政治》《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等。

郑小容,旅美学人。先后师从四川大学缪钺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杜敬轲教授、康达维教授,研治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学。1989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华盛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西雅图。

延伸阅读

陈朝是继南朝萧梁之后,由陈霸先建立的王朝。陈霸先自言乃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世居颍川,永嘉南渡后,定居于吴兴长城县。梁末,助王僧辩平定侯景之乱。后又击败北齐,诛杀王僧辩,掌握朝廷大权。梁敬帝太平二年(557)禅代称帝,国号陈,改元永定。陈霸先为高祖武皇帝。永定三年(559),其侄陈蒨即位,为世祖文皇帝。文帝崩后,太子伯宗即位。太建元年(569),陈霸先侄、陈蒨弟安成王陈瑒废伯宗自立,为高宗宣皇帝。其后宣帝子陈叔宝即位,是为陈后主。祯明三年(589)正月,隋朝大军攻入建康台城,后主被俘,陈朝灭亡。

陈朝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西北与西魏(后为北周所代)、东北与北齐相对峙。时西魏自南朝掠得巴蜀、汉中大片土地,国势方盛;北齐则将江北淮南大片区域收入囊中,国力仍强。陈朝所面临的是“江北之地,悉陷高齐,汉川、蜀川,没于西魏”的局面,不仅失去了长江上游的益州,也丢失了江淮的屏障,是南朝版图最小、国势最弱的王朝。除了外部威胁,陈朝内部矛盾也错综复杂,梁朝宗室余众,思复故国,各地首豪,拥兵自重,可谓“内难未弭,外邻勍敌”。即便如此,陈宣帝即位后,一度“志复旧境”,于太建五年(573)三月,命吴明彻率军北伐,并在数月之间,收复江北淮南二十余州,但北伐战事很快由胜转败,陈朝国力由此愈加衰弱,最终为隋所灭,南北分裂数百年的局面宣告结束。

《陈书》同《梁书》一样,署名姚思廉撰,实为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历经陈、隋、唐三朝,“更数十岁而后乃成”,最终成书在贞观十年。姚氏父子撰书主要依据陈史官所修国史、起居注、政书等,对前人相关史著也有吸收。《陈书》是唐初官方组织修撰的南北朝五史之一,卷六《后主纪》末有总监修官魏徵总结陈朝一代兴亡的论赞。书中除政治和军事问题外,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方面,也都保存了一些资料。《陈书》叙事简严完善,较为全面地反映有陈一代历史面貌,后世学者对《陈书》的编次体例、史笔文法等评价较高,是研究陈朝历史的必备史料。

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张维华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宋云彬先生负责编辑整理,1966年前基本完成点校和编辑工作,1972年出版。点校本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为底本,参校了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和金陵书局本等版本,以及《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等典籍;对前人的校勘成果,则主要采用了张元济、张森楷两种《陈书校勘记》稿本以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由于比较广泛参校了各种版本,综合前人著述,对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也多有汲取,点校本在校勘、订误等方面有不少创见,在分段和标点方面尤能悉心体察史家叙事的内在逻辑,顾全史文节奏与史事完整性,处理颇见惬意。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是目前最为通行的整理本。

修订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以原校本为基础,订正其中的讹误遗漏,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在充分尊重原校本本校勘成果的前提下,清理复核了原校本的全部校勘记。原校勘记无误者,保留沿用;可补充新的文献证据者,适当补充改写;有误者加以订正并另拟校勘记;原校本对底本有重要改动而未出校以及少数失校之处,酌情补加校勘记;原校勘记确实无必要或与修订体例不合者则予以删除。同时遵照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标点分段办法,修改完善标点,对个别分段进行了适当调整。

《陈书》点校本校勘记原有534条,修订本增加到960条。其中,修订本新增校勘记542条,删除原校勘记约110条,改写原校勘记约160条,修改补充原校勘记185条,沿用原校勘记73条。

此次修订选用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此本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之九,用日本静嘉堂文库本及北平图书馆甲库所藏三种宋刊残本拼为全本,于1933年11月由上海涵芬楼影印出版,随后编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故与百衲本陈书实为同一版本而印行稍早。此外,以平安写本、残宋本、宋甲本、宋乙本、静嘉堂本、国图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为通校本;以三朝本、局本为参校本。修订中我们注重参考陈书早期刊本和写本,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凡底本有误者,据校本改正,并出校说明;义可两通者,保留底本文字,异文写入校勘记;底本无误而校本有误者,一般不出校勘记;底本及校本皆误者,一般保留底本原貌,出校说明。

此次修订高度重视古今学者的学术成果,对清代以降尤其是点校本陈书出版以来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成果,广泛收集和充分参考和采纳吸收。

被日所劫3万余册古籍归还始末

抗战时期郑振铎抢救珍贵古籍新史料发掘研究(1)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沦陷,各地藏书楼毁于兵火者不计其数,藏书家纷纷将家藏典籍求售维生。在“江南文物遭劫最甚”的世乱之中,知识分子纷纷避难大后方,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1898-1958)执意留居上海,秘密为国家搜求古籍。抗战八年间,郑振铎始终战斗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与日本、伪满、美国前来上海掠夺抢购文献的各方势力斗智斗勇。1938年6月底,郑振铎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抢救沦陷书坊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又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孤本元明杂剧”)。1940年1月至1942年12月,“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郑振铎的带领下展开了。郑振铎和徐森玉、张元济、张寿辅等人结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军爪牙密布的上海,秘密收购近5万册在日本侵略江南之后流散沦亡的古籍善本,避免了中文献落入敌手、流出海外。

由于对日方史料文献的利用不足,过去研究者侧重于考察郑振铎在上海的“抢救”工作,无法凸显郑振铎“与敌争夺文献”的对抗性和危险性。2016年以来,我们在日本防卫省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单位,寻访到一些长期以来中日学界未能留意的日方档案、个人日记和口述史等新史料,通过与近年披露的相关日记、信件史料进行互文性阅读,重新书写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仁在这场“文化抗战”中的光辉历史。加上日方文献所提供的“掠夺者视角”,再回看郑振铎及其同志的文化救亡,我们更能体会到先人抗战的艰苦卓绝。

1941年夏天,日军收紧对上海孤岛的包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来的3200余部善本文献,分为3800多个邮包寄到香港大学,加上叶恭綽在香港所购古籍共111箱,均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放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同年秋天,重庆方面决定将这批古籍抢运到驻美国总领事馆。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珍珠港袭击,同日进攻香港,原定12月6日载运古籍赴美的格兰特号轮船,未能如期起程。12月28日,日军侵略军宪兵队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发现这111箱古籍。1942年2月上旬,日军23军将包括中央图书馆古籍在内的各单位图书搬离香港大学。1942年3月,日军从香港劫走的近5万册中国古籍运到东京,大部分转至“帝国图书馆”(战后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在经历了开箱整理、迁移外地隐匿、地下室随意储藏之后,于1946年2月被盟军发现。

以往研究者在研究中国被掠古籍这四年的遭遇时,多以收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教育部密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档案》中的《要求日本归还图书》,以及收入《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的《外交部致北平图书馆说明日本战犯掠夺图书经过情况》为据。然而这三种材料其实属于“第三手材料”,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教育部根据赴日代表团从日方那里获得的情况说明再汇编而成的。为了隐瞒战时罪行,日方提供的信息本身就有一定的欺骗性与倾向性;中国赴日代表团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开展工作量庞大的追索工作,其报告也可能存在混乱与失实。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史料的源头,即相关的侵华日军、帝国图书馆和战后接管日本的盟军总部等单位的记录档案。以下按照中国被掠文献在日行踪的先后顺序,一一说明近年我们在日方档案方面的发掘工作。

1.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侵占香港的日本陆军第23军,配备了“兵要地志资料班”,专门负责掠夺和整理文物文献。1941年12月28日,在接到日军宪兵队的报告之后,日军少佐宫本博、大尉肥田木近,来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处理这些文献,并于1942年3月全部将之启运日本。作为“掠夺文献”的经手人,宫本博、肥田木近二人的证词十分重要。1946年,盟军总部责令“第一复员省”(即战前的陆军省)全面追查陆军军人在战时掠夺财产行为,已经复员回到宫崎县、神奈川县的宫本博、肥田木近,接受军方的问询并手书写下回答,这些档案现藏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

2018年2月,笔者到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阅档案,通过仔细阅读23军相关人员的书面报告,发现这些军事档案可以补充更多关于中国古籍在香港被劫经过的细节。宫本博回忆了第一次见到中国古籍的具体情形,当时全部古籍还存放在为船运特制的铅板二重包装大木箱中,军部决定原封不动运往日本。

2. 东京帝国图书馆的相关图书档案

为了逃避战败后的责任追究,日本文部省、帝国图书馆在1945年秋天曾经销毁大量档案记录,因此中国古籍在1942年抵达日本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间的第一手档案资料相对匮乏。2001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在编撰《国立国会图书馆五十年史(资料编)》之时,将战时帝国图书馆资料编成系年体概要。我们可以根据此书所载内部文件以及引用的参与中国古籍整理的馆员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梳理出古籍“香港—文部省—帝国图书馆”转运的各个时间点。

1942年3月之后,日军从香港劫走的近5万册古籍陆续抵达东京。11月26日,陆军参谋总部将包括中央图书馆古籍在内的200箱共4万册“虏获图书”作为战利品,转交文部省。1943年7月24日,文部省把这4万册图书运到上野的帝国图书馆。为了尽快了解“虏获图书”的性质与价值,8月23日,文部省发文要求帝国图书馆先行整理134箱汉籍,10月中旬提交三份图书目录。这就是郑振铎等人在上海抢救的那一批古籍。面对如此庞大而精美的中国古籍,日本图书馆的从业人员完全不具备整理的业务能力。帝国图书馆负责馆务的司书官冈田温,从出版业、古书业界紧急招募了一些临时馆员,又邀请赋闲在家的高中大学时期同窗好友、时称“日本近代文学第一人”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出山主持整理事务。长泽规矩也认为这批古籍价值殊高,冈田温一再向文部省要求延长目录交付时间期限,获得同意之后,长泽把整理目标调整为写出一本详述行款、各卷纸叶数、纸张样式、补配情况、刻工姓名、藏书题识、藏书印记的版本解题。如此一再延误,比文部省要求的提交目录时间晚了整整一年。到1944年8月,长泽等人才算完成经部、史部647种古籍的解题目录,还有近3000种古籍来不及整理,日本就战败了。

我们还发现一个之前从未被揭露的事实:郑振铎抢救的这一批文献的巨大价值,在日本是经过长泽规矩也这样的专家不断重申,才获得官方的重视。

郑振铎在上海抢救文献时,抱着“史

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的爱国激情,注重抢救史部书籍,就是为了避免敌人载之东归,“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他极力主张买下嘉业堂藏书,也是由于嘉业堂藏明人史料书为其精华所聚。在东京,长泽规矩也经过一年的版本研究,发现此批中国古籍最具价值的是以写本为主的明代史籍,于是他向官方汇报应该大力宣传这些战利品,特地让冈田温去说服帝国图书馆的馆长。考虑到掠夺图书还是向学界大范围公布为妙,帝国图书馆在1944年8月盟军日夜空袭的情况下,举办了一场面向东洋史研究者的非公开“明代史料展览会”,入场者只有30余人,之后又举办了一个明代资料恳谈会,参观学者就这些中国古籍畅谈明代史研究发展的新可能性。可以说,郑振铎所担心的“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一部分已经在东京发生了。

1943年10月至1944年8月,帝国图书馆向三百公里之外的长野县立图书馆疏散了全馆价值最高的13.3万册贵重图书。“明代史料展览会”之后不久,已经完成整理的2万册中国被劫善本也在疏散目录之中。1945年3月,整批图书又转移到饭山女子高中的体操场。8月中旬日本投降之后,1945年8月下旬,13.3万册贵重书籍运回东京上野,而其中的2万册中国善本为了避开美军和中方的侦察,又一次被发往外地,这一次是藏在伊势原市高部屋村原村长小泽家的地窖里。本来迁出这么大批量的书籍,帝国图书馆应该留下文书记载。但是1978年国立国会图书馆为了编纂馆史,特地调查了前后档案,也没能找到直接的记录,只能从财务支出的会计帐簿推测,疏散到伊势原的古籍约计2万册。

日方煞费苦心地隐匿中国古籍,企图躲过盟军的追查。1944年被长泽规矩也挑剩的一万五千册善本,被归入“乙部图书”,1944年12月之后被移至毗邻帝国图书馆的东京博物馆地下室保管。

3. 战后GHQ相关档案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战胜国在东京设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简称“盟总”,英语缩写GHQ。1946年4月根据盟总《调查与集合劫取物资产命令》,设置“终战连络中央事务局政治部特殊财产课”,目的在于调查在日本的盟国被劫资产。中国驻日代表团追索中国被劫资产,以及要求日方归还掠夺资产,均须通过“终战连络中央事务局”的指挥与管理。这一时期与中国古籍相关的盟总档案,目前存放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宪政资料室,我们主要调查了其中的“民间财产管

理局档案”等三份档案,明确记载了日军从香港掠夺的中国古籍目录、暂存日本的现状以及盟总追查的手续过程。1946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联络处曾向盟总提交一份名为《Chinese Classics》的英文备忘录,描述中国古籍“被积压在一个潮湿而封闭的地下室房间内,它们已被长期暴露于外并且受损严重”。

盟总对于中国追索被劫文物的规定甚严,要求中日双方各列出目录清单,尤其是对被劫方的中国,举证要求列出具体说明与确切证件,据1946年4月赴日参加追索工作的王世襄回忆:“联合国(注:当系盟总)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要求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只有当中国举证的证据与日方的记录相吻合之时,才有可能被盟总认可并办理手续。

1941年底,叶恭綽带领的香港庚款小组赶在装箱之前,在每本古籍上加盖“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和“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个章印,这成为追索央馆古籍最直观的证据。除此之外,盟总要求中方提交一份具体的“清单书目”,既然中方不可能逐本查勘帝国图书馆的50万藏书,从中筛选出中国被劫图书,那么这份书目就只能从香港大学或者上海郑振铎那里拿出来。1939-1941年,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全部古籍均经郑振铎之手,善本目录系郑振铎一人之手抄写;1941年寄到香港的七批书,每一批皆有相应的“存港书目,诸留备查考”,郑振铎在《求书目录》中也说“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事实上,无论是香港的中庚庚款委员会,还是南京的中央图书馆,以及东京的帝国图书馆,被掠至日本的3万多册古籍,只有郑振铎一人掌握着最全的目录。因此这份天地间独一无二目录,就成了中国代表团追索劫物最具说服力的铁证。

以帝国图书馆对中国古籍的第二次“疏散”及其瞒匿意图,日本单方面临时整理的书目大概很难达到中方所希望的如实与准确。所幸,中方还有郑振铎整理的原始装箱书目,为追索行动提供了明晰的清单、有力的证据,挫败了日方隐藏部分图书的企图,保证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完整回归。1946年6月,先有十箱古籍航回国,1947年5月,中央图书馆被劫的34970册古籍全部运抵上海。